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入场途径及知识形态

初清华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认识,很多论者将其归纳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分天下,或者简化为"左"与"右"的区别。在新时期文学知识场,最初文学批评中看似缺席的"浪漫主义"文学知识,隐匿于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及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之中,并在科幻小说,舒婷、顾城等部分"朦胧诗"创作,昌耀和海子的诗歌,以及部分所谓的"知青小说"创作中得以延续。主要经历了由"想象"到"抒情性"的认识过程。

关键词:浪漫主义;新时期文学;知识场;想象;抒情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2-0105-07

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一样,都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概念。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一词来自中世纪用各国由拉丁文演变的方言所写的浪漫传奇,同时,也被用来指代一种文艺思潮。二十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西方文论术语被引进中国。在"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场域重新生成之时,相比起现实主义的高歌猛进,浪漫主义则可以称得上是杳无声息。1976年到1978年,"两结合"创作方法重新被论证其权威性,现实主义正准备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名义来获得重回场中的合法性,此时被等同于"高于生活"理念口号的浪漫主义则被缚在"四人帮"阴谋文艺的耻辱柱上难以翻身。在新时期之初第一阶段关于"真实性"的探讨中,"浪漫主义"被大多数论者等同于假大空的"阴谋"文艺。于是,新时期文学史大部分被描述成"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二分天下,是否"浪漫主义"在中国真的就此断流,销声匿迹了呢?

一、正名与传播——隐匿于文学研究中的浪漫主义文学知识

可想而知,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浪漫主义"并不是一个肯定性词语,也颇受冷遇。尽管如此,为了文艺繁荣,仍有个别理论研究者试图撰文为其正名。最初,把"浪漫主义"作出"积极"与"消极"的区分,试图借助重塑"两结合"的权威来抗衡声势浩大的"现实主义"回归浪潮,谋取新时期文学知识场中的一席之地。

1978年仅有《还浪漫主义以本来面目》一篇为浪漫主义鸣不平的理论探讨文章发表,文中借鉴高尔基区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观点,试图把浪漫主义从"四人帮"的阴谋文艺中解救出来。认为"'四人帮'侈谈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过是个道道地地的骗人的口号,说穿了原来是'远离生活,伪造生活'的代名词,跟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毫无相通之处",是属于"被马克思讥刺为'漂亮的文学制造商'的夏多勃里昂(法国)以及诺瓦利斯、希勒格尔兄弟(德国)等人"的消极、反动的浪漫主义范畴。该文以作家的世界观不同作为区分消极与积极的标准,革命的理

收稿日期:2008-02-27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60400949);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资助项目(0602023C)

作者简介:初清华(1978—),女,山东文登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

想就是进步的、积极的,而认为“寄理想于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中世纪的田园生活,以此作为自己的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则“只能说是反映了那些人政治思想的复辟倒退和世界观的腐朽没落”[1]。

此时《论民族民间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尽管也论及浪漫主义,却反映出创作方法上重现实主义而轻浪漫主义的偏见,该文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成熟的典型的文艺思潮,是社会发展到比较近代的产物,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之所以大量是充满幻想的浪漫主义,是停留在较早的或原始社会的阶段。并对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给出以逻辑和理想为评价标准:“积极浪漫主义故事情节的发展,在表面上其幻想逻辑的线索,鼓舞人们奔向生活的理想,奔向理想的未来,从而激发人们在现实斗争中的勇敢与智慧。如果不能作到这点,却为幻想而幻想,沿着幻想的线索、幻想的逻辑,逃避现实斗争,光追求离奇的情节,这就变成了消极浪漫主义”[2],实际仍是把浪漫主义等同于幻想和夸张。

此时以作家的世界观为标准而作出的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区分,其实质仍是以往“政治标准第一”思维的延续,而忽视其作为一个批评术语所蕴涵的审美要求。这种区分似乎是给了浪漫主义一点名分,但在“真实性”的前提下,积极浪漫主义被等同于理想主义,隐于“革命现实主义”或“两结合”之中,而消极浪漫主义则被贬为不切实际、不合逻辑的胡编乱造,在文学批评中有时也与“现代派”混为一谈。其实质却是要把浪漫主义扫地出门。事实上,这种区分为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批评定下了评价浪漫主义的基调。尽管在1980年初作家丛维熙就发出对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呼吁,但随后出现的三篇想为浪漫主义正名的文章中,赖力行《浅谈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真实》、竹可羽《不要放逐革命浪漫主义》二篇,单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作者所要表明自己肯定是革命的、积极的这一基本立场。让人稍感遗憾的是由叶易执笔的《关于浪漫主义》,原本已经触及到它的美学特征,认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强烈地表现理想和愿望,描绘人们‘应有’的生活图景”,“由于要强烈地表现理想,它的想象就很丰富,很奇特”,同时由于“人物与环境是不能分开的。人物的性格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塑造这样的形象,与之相适应的往往有奇异的环境和情节”,“作家由于对理想的渴望和急切的追求,就必然表达出强烈的感情,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所以“往往更多地采用夸张、比喻等手法”,“采用奇特的幻想和虚构等表现方式”[3]。但终还是狗尾续貂般加上一个对消极浪漫主义的否定,可见其受时代认识制约的局限性。

尽管其后为浪漫主义辩护的文章,也能鲜见于报端①,但真正开始明确要突破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界限的认识到1983年才出现。1983年可谓新时期文学场域中“浪漫主义”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最为风光的一年,有严永通《向神话学习浪漫主义》、刘溶《“两结合”方法自古已有,革命浪漫主义不应忽视》、贺建成《谈浪漫主义的真实性》、林雨《文学上的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浅沦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肖君《浪漫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艺术》等理论文章,以及对于中国古代、现代,西方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家作品研究文章,共65篇。这一年还出现关于浪漫主义小范围的论争,缘起于《文汇报》1983年4月5日发表何满子《论浪漫主义》,认为浪漫主义有“‘先天’的残疾性的缺陷”,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极致,就跃进为现实主义”,来确证现实主义高于浪漫主义的观念。《文汇报》1983年5月3日发表姜国庆《为浪漫主义一辩——与何满子同志商榷》,

① 1981年有三篇:徐季子《为浪漫主义说几句话》(《东海》1981年第2期)、黎汝清《要有浪漫主义》(《解放军文艺》1981年第7期)、徐岱《浪漫主义也是一种创作方法》(《文艺研究》1981年第2期),仍然是论证积极浪漫主义的合法性。1982年则只有一篇宋隧良《真假浪漫主义》(《柳泉》1982年第2期)。

邹平作《为浪漫主义一辩》与何文论争。其中邹文大胆肯定消极浪漫主义的作用，认为无论消极浪漫主义还是积极浪漫主义，在历史上都曾作为古典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它们反对古典主义在艺术上的僵化，反对压制个性，束缚创作自由。在艺术表现上，它们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对过去只注意从政治思想进步与否来区分消极和积极两种倾向的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提出批评，倡导要对浪漫主义在艺术手法上的共同性进行研究。可见，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区分的逐渐消解并不是自刘小枫《诗化哲学》才开始的，它的消解源于对文学独立性之于政治束缚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浪漫主义”认识的深入。

新时期文学知识场中，与浪漫主义在文学批评中所受冷遇不同，浪漫主义文学知识在新时期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特别是“五四”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的研究中不断扩充着自己的领地，这其实是对文学批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声援。在现实主义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名义挑战“两结合”的权威地位的 1978 年，原陆《民歌与革命浪漫主义》、吴天霖《＜女神＞的积极浪漫主义特征》、刘正强《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三篇论文，对当时被肯定的民歌和现代作家郭沫若的《女神》中浪漫主义文学知识的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浪漫主义文学知识的作用。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也为浪漫主义文学知识的传播添砖加瓦。仅 1978 年出版的浪漫主义作家作品就有：法国作家雨果《悲惨世界》（李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4 月版）、《九三年》（郑永慧译，吉林出版社 1978 年 4 月出版）、《笑面人》（鲁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 6 月、1978 年 11 月两次印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1 月出版），苏俄作家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6 月版）、拜伦《唐璜》（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 6 月版）、雪莱《伊斯兰的起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等。事实上，在 1978、1979 年的外国文学名著翻译中，浪漫主义文学知识主要呈现在童话和外国科幻小说中，仅《安徒生童话》就有几个版本，几百万的印数。

这些对某些中国古代、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的研究，以及翻译作品的出版，一方面是对“真实性”讨论的回应，同时也大都烙有其时文学界、评论界对浪漫主义文学认识的特征：剔除了浪漫主义文学中张扬作者主体性的文学精神，而仅仅把浪漫主义视为一种作为现实主义补充的、重虚构、幻想、夸张的创作方法。在新时期文学知识场中，能把“浪漫主义”从文学批评所作积极和消极的狭隘区分中解救出来，主要应归功于对美学由哲学向心理学转变的探讨和对文学艺术形式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现代派”艺术态度的改观。

在关于浪漫主义的讨论中，1984 年发表的邹忠民《关于浪漫主义的评价问题》[4] 一文，开始彻底摆脱消极与积极浪漫主义的区分，把重主观的文学精神和以想象、虚构为主要创作方法相结合来重新认识、评价浪漫主义。文中首先是以真实性为突破口，根据在研究中已经得到肯定的屈原《离骚》、郭沫若《女神》、雨果《悲惨世界》等作品的成就为据，提出：“有的同志认为浪漫主义的特点就在于用主观来歪曲客观”、根本缺陷在于“用自己的理想来解释世界”做出反击，认为浪漫主义可以反映现实，“并不是指它所反映的生活现象的形态是否真实，而是说它立足的基础或出发点是现实生活，并折射出生活的一定本质真实”，丰富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内涵。但是该文仍把浪漫主义局限在“最突出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所反映的生活是理想的或愿望的或幻想的，是现实的一种主观真实”，表明此时对于浪漫主义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仍拘囿于“理想化”，没有明确意识到“抒情性”特征的重要性。

1985 年景国劲《新时期小说与浪漫主义》发表，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新时期小说创作中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意味着浪漫主义文学知识在新时期文学知识场中，真正占据了一席之地。该文认为新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有一股浪漫主义思潮[5]，七、八十年代之交，由从维熙、叶蔚林、王蒙等中年作家发出信号，尔后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从 1982 年以后，革命浪漫主义思潮又由梁晓声、张承

志、冯苓植、邓刚、陈放等青年作家将之推向高潮。这些小说的审美特征表现为:一、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抓住人的心灵和情感曲折地折射现实世界,表达作家对未来的憧憬、对理想的追求,从而对现实生活作出更为深刻和高层次的理解;二、以抒情的叙事方式,抒发强烈的革命激情,使小说具有了诗与音乐的气质;三、人物形象奇特而强烈的个性和男子汉粗犷豪放的气质所呈现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四、喜爱描写大自然,作家审美意识赋予自然形象以灵性,呈现出美的意境;五、崇高之美和阳刚风格。该文完全剔除了阶级论的影响,只有用美学的观点来审视,"浪漫主义"文学知识所蕴涵的抒情性特征才能被显露出来,这表明八十年代中期对浪漫主义文学知识的认识与八十年代初以"理想"为核心的认识已经有所不同。

正是通过借用作家革命性的阶级分析法区分出"积极"与"消极"的策略,先把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观性、理想化特征解放出来,再用美学的视角来消弭人为划出的"积极"、"消极"间的界线,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文学知识,开始以较为全面的美学形态立足于新时期文学知识场并在创作中得到传承。

二、"想象"与"抒情"——创作中的浪漫主义谱系

正当刚刚恢复写作权力的文学知识分子们以笔为旗,捍卫文学"真实性"而对所谓"四人帮"炮制的虚假"浪漫主义"口诛笔伐之时,一度被等同于"假大空"、"理想化"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首先在科幻小说找到寓身之所。而浪漫主义文学精神则主要体现在舒婷、顾城等部分"朦胧诗"创作,新边塞诗人昌耀和海子的诗歌,以及部分所谓的"知青小说"中。

应该说,新时期科幻小说主要是以繁荣儿童文学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名义在1979年掀起了创作高峰。科幻小说,在"文革"前就带有"科普情结",这主要是由于大批苏联科幻、科普作品和凡尔纳小说被译成中文,为中国科学文艺创作提供了样本;同时,在1956年初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承担起教育和宣传的特殊使命,仅作为儿童文学中的一个品种而存在,局限了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因此,当1978年科学文艺重新出现在新时期文学知识场中时,仍然把它作为"儿童文学最重要题材之一"来提倡。当时文学界聚焦于对现实题材禁区的突破,无暇关注儿童文学和科幻小说,浪漫主义想象和理想化特征因此得寓于其中。

新时期科幻小说具有流派性特征,有科学性、文学性之说,也可用"硬派"、"软派"来概括。所谓"软派",即注重小说的文学性特征,主要是指以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金涛《月光岛》,肖建亨《沙洛姆教授的迷误》,叶永烈的"金明"系列推理案《球场外的间谍案》、《X-3案件》、《失踪之迷》等,以某一科学幻想为契机,反映某一"社会问题"为主要目的的小说。由于其具有"成人化"特点,也是争议最大,受诟病最多的一类。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因其对少年儿童产生的不利影响而饱受挞伐。被视为"硬派"科幻小说代表的刘兴诗《美洲来的哥伦布》,肖建亨《万能服务公司的最佳方案》,应其《驯火者之死》,李登柱《神奇的帽子》等作品,则是以某一科学幻想为结构文章的主要线索,更注重科学性,应该说是对儿童、成人读者都适合的创作。事实上,除此而外,仍有大批的少儿科幻作品如缪士《古园"魔影"》、《奇怪的"潜水员"》、《失踪的爸爸》,王亚法《魔枕》,王琴兰、王沂《海豚派软糖》,嵇鸿《秘密就在老医生身上》等带有童话色彩的科幻创作,大都带浸染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文学色彩。

童话的浪漫主义色彩无需赘言,所受争议最大的"软派"科幻作品也承载着浪漫主义文学重夸张、想象的创作思维。郑文光是科幻小说理论的重要倡导者,特别强调小说的浪漫主义特征,认为科幻小说不算儿童文学,首先应当是小说,优秀的科幻小说应当列入严肃文学作品之林。这种文学形式既继承了古典幻想小说的传统,又带有崭新的科学化时代的时代特征,它可以超越时空,甚

至深入人类所到达不了的领域，因此它有极其广阔的自由度，抒发情感，阐明哲理，剖析人生，成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新的文学品种。同时，不能要求科学幻想普及科学知识。因此在小说结构中，幻想的特点不避讳夸张手法的运用，更注重想象的作用。就艺术观念而言，他是从重视“情节”转向对塑造“新人”形象的关注[6]。

新时期科幻小说中塑造出的当代英雄人物，大都具有掌握科学知识报效祖国人民，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如《珊瑚岛上的死光》中赵谦教授、陈天虹及马太博士为保护自己的发明不被战争狂徒利用，献给祖国而将生死置之度外，《飞向人马座》中的三个年青人，如何利用宇宙飞船中的图书馆，掌握科学知识成长为宇宙空间的英雄。即使是强调逻辑推理科学特征的叶永烈，用一系列案件来塑造出被誉为“警察博士”、“科学福尔摩斯”的“金明”，也是个掌握了现代化科学知识公安干警的爱国“英雄”形象。再如《月光岛》中的梅生，这些主人公大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具有理想主义爱国情怀。

并且这些科幻小说大都确证了“科学”的神话地位，把科学想象现实化。特别是对于当时流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起到重要传播作用。刘肇责《β 之谜》就是以“控制论”为基本原理，构建了一个仿生机器人贝塔、伽马可以相互控制，同时被人控制和反控制的故事。而步实《特别护理》则是把“系统论”和“控制论”相结合的力作，写了医生沙德强要控制并关闭自己的自动调节系统，结果是最终明白了“什么叫大系统？大系统就是变量多、结构复杂、功能综合、规模庞大的系统。海洋、大气、大型工程设施是大系统，社会、文化、经济也是大系统，人体也是大系统”[7]，自动调节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重要补充。至于“信息论”则是在科幻小说中更为常见了，如王孝达《莫名其妙》中的祁云由于注射了主要成份为酶 X 的“9946”，而可以遥感几千公里以外的盆景、人和东西等，原因就是客观存在着既非电磁波亦非粒子流的、以光速传递、几乎无可阻拦的“MQ 信息”，而且这种“MQ 信息”可以被激发，也有发射和接受的问题。科幻小说在塑造英雄人物和确证“科学”能够创造神话这两方面的浪漫主义想象，应该说是契合了时代氛围，在当时颇为畅销。后遭到文学界和科学界的联合围剿，科幻小说于 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中逐渐淡出创作。

与科幻小说主要是承袭浪漫主义文学的重夸张、想象的创作手法不同，在新时期之初文学知识场中，以舒婷、顾城、昌耀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则更多地关注于情感的抒发与自我个性的张扬。八十年代中后期，“朦胧诗”衰减之后兴起了真正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品格的诗歌创作大潮中，浪漫主义文学仍有自己的代言人——海子。正如有些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也许只有通过海子，我们才能结束浪漫主义。”[8]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诗歌创作，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场域中的浪漫主义文学知识经验。

以论争姿态进入新时期之初文学知识场的“朦胧诗”当时被称为“现代派”，很多论者因而视其为新时期文学知识场中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其实并非如此，他们的创作蕴藏着以主观抒情“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和以怀疑主义哲学为基础探求“陌生化”文学经验为目的的现代主义两种类型。舒婷诗歌中存在着的浪漫主义特色，孙绍振早在 1980 年就已经指出，“从大自然现象出发，经过主观色彩极浓的抒情逻辑，达到对生活作哲理式的概括，正是欧美浪漫主义诗歌的常用手法，这种手法有利扩展作品的生活容量和加强思想的深度。”[9]江枫与程代熙商榷的文章中曾以艾略特为例，加以分析后认为“‘表现自我’并不是西方现代主义各派的一般特征和共同特征（倒是浪漫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10]

确实如此，强调“表现自我”的美学原则，凸现了浪漫主义美学特征中的抒情性特征。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新诗潮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诗歌中大都突出了“我”——这个抒情形象，那么，顾城可能是其中最执着于“我”的探索者。在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诗作中，更多地流淌着的是自然

主义的眼光。虽然早在1979年顾城写出传诵至今的哲理诗《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曾被有些论者视为“导向个性的自觉”,没错,“寻找”预示着“主体性”的觉醒,但他寻找的方向不是“我”,而是处于“社会的边缘”的自然。所以在《学诗笔记》中,诗人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感谢自然,使我感到了自己,感到了无数生命和非生命的历史,我感谢自然,感谢它继续给我的一切——诗和歌。”[11]因此,这一阶段顾城诗歌中的“我”,更为突出的是“眼睛”,是“我看”。正是在这样一双“黑眼睛”的注视下,世界万物都有了生命,“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背影,花朵梦想着蝴蝶的轻吻,露水梦想海洋……”充满了美和哲理。在这双“黑眼睛”里,相比起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更偏爱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是这样,“自然”给了顾城自由梦想可能存在的天堂,这使他更深切地体会到社会、文化带来的束缚。

与顾城诗中剔除了人的社会活动的纯净不同,昌耀的诗更显示出一种沉淀了历史与文化的厚重。西北高原的自然风情,强调人与自然的抗争成为昌耀的诗中常驻的母题。尽管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亘古以来却依然留下生生不息的足迹。在昌耀诗中人与自然的融为一体不是靠审“美”,更多的是靠“奋斗”,似乎人与自然的对抗早已命定。自然如此神秘、强悍,人的抗争就显得如此悲壮,因此他的很多诗歌更像是唱给殉道者的赞歌,充满阳刚之美。诗人自己也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是的,当我触及到‘西部主题’时总是能感受到它的某种力度,觉出一种阳刚、阴柔相生的多色调的美,并且总觉得透出来一层或浓或淡的神秘。——我以为在这些方面都可能寻找到‘西部精神’的信息。”[12]已经有论者指出要谈昌耀诗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写于1980年春,又三易其稿的《山旅——对于山河、历史和人民的印象》不能不提。确实如此,作者对历史进行反思以后,对“英雄主宰生灵万物”的现象发出质疑,流放者的苦难在诉说中,因为找到了“人民”,而不再值得叹息。“一切,都叫人难于忘记:/那经幡飘摇的牛毛帐幕,/那神灯明灭的黄铜祭器,/那板结在草原深层的部落遗烬……告诉了我人民的善良、坚韧、虔诚/和难得的朴实”,正是因为他们的“美”,“我才没能完全枯萎”。因此,笔者并不十分认同所谓诗人在表现“悲剧精神”的说法,如果诗歌不能带给诗人希望和力量,又能靠什么支撑去闯那苦难和孤独的煎熬?对于诗人昌耀而言,没有鲜花和桂冠的世界里,诗歌就是他理想的栖息地,是他借以疗现实之伤的良药,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孤独吟者。

顾城、昌耀用诗歌表达了各自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丰富着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知识形态,至于海子,至于那些在遥想中用温情软化了苦难生活的“知青小说”,都提供了属于作者自己的浪漫主义文学经验。海子用他的生命为诗歌划下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也让他的诗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此成为不朽,他诗作中的温暖与孤独的纠缠,成为区别于顾城的童心、昌耀的坚忍的另外一种浪漫主义诗歌经验。恰如有些诗评家所言,“海子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守望,挽留住了浪漫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抹余晖。”[13]①

或许新时期文学场域中还有很多让我们不得不提的洋溢着浪漫主义诗情的文学作品,比如张承志《北方的河》、邓刚《迷人的海》、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冯植苓《沉默的荒原》等等,除了本章第一节中已经提到过早在1985年就已经引起论者对它们的浪漫主义知识进行研究外,还有论者认为《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北极光》、《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这些作

① 在《海子:先锋诗歌的“死亡”或“再生”的临界点》一章第三节“浪漫艺术理想的余晖”中对海子诗作的“浪漫主义追求”所作艺术分析,主要概括为:一、“家园”的回味与虚拟;二、主题语象:麦地与水;三、语言的杂色和“歌”诗化;四、反抗文本:个人化写作的先声。

品，确实证明了欧洲浪漫主义及其中国类似潮流的一些文学准则再度出现了。”[14]① 本文在此就不再多做赘述。但是不论是诗人还是小说家选择了怎样的艺术形式，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或是在“人、自然、社会”中填入历史、文化的佐料来展开自己对世界、对现实的想象和理解，“爱”、“崇高”与“美”，总是这些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中最感人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龚济民. 还浪漫主义以本来面目[J]. 破与立，1978，(6)：46－49.
[2] 朱宜初. 论民族民间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J]. 思想战线，1979，(4)：29－39.
[3] 叶　易，执笔. 关于浪漫主义[J]. 上海文学，1980，(3)：93－94.
[4] 邹忠民. 关于浪漫主义的评价问题[J]. 文艺研究，1984，(5)：79－82.
[5] 景国劲. 新时期小说与浪漫主义[J]. 当代文艺探索，1985，(3)：56－61.
[6] 郑文光. 进一步发展儿童文学创作：从科幻小说谈起[J]. 文艺报，1981，(10)：9.
[7] 步　实. 特别护理[M]//科学神话(1979－1980).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0：93.
[8] 崔建军. 海子诗歌的家族谱系与冲击力度[M]//不死的海子.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67.
[9] 孙绍振. 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J]. 福建文艺，1980，(4)：62.
[10] 江　枫. 沿着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道路前进——为孙绍振一辩兼与程代熙商榷[J]. 诗探索，1981，(3).
[11] 顾　城. 顾城诗全编[M]. 上海：三联书店，1995：896.
[12] 昌　耀. 诗的礼赞[A]. 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298.
[13] 罗振亚. 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6－140.
[14] (加拿大)杜迈可. 新浪漫主义小说——“思考的一代”[J]. 张　敏，译. 批评家，1987，(2)：78.

The Admission Way and Form of Knowledge of New Era Romantic Literature

CHU Qing-hua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For the New Era Literature, many commentators summarized it as “realism” and “modernism”, or simplified it to the “left” and “right” distinction. The “Romantic” literary knowledge which appears to be absent in the former literary criticism, has hidden in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y, and has been continued in science fiction, some of the “Obscure Poetry” of Shu Ting and Gu Cheng, the poems of Hai Zi and Chang Yao, as well as some of the so-called “educated youth novel”. It experienced a recognition process from “Imagination” to “Lyricism”.

Key Words: romanticism; the new era literature; knowledge field; imagination; lyricism

① 该文作者认为，这些作品具有某些浪漫主义特色，诸如主人公的孤独、忧郁和对真、善、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普罗米修斯式的叛逆者形象，自传体或自白式的写作方法，对浪漫爱情的尊崇、渴求，以及运用象征手法描写大自然。